

哈馬斯將往何處去？

• 丁松泉

專制社會或受壓制社會向民主、自主和自由的社會轉型的過程，是社會動力學意義上的「力」的相互激蕩的過程，其中一個重要現象是社會能量的釋放，這些社會能量成為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推動和促進社會激蕩的一種動力。被社會仇恨、長期被壓抑而彌久益熾的熱望、被宗教或其他某種意識形態激發的烏托邦激情，會在轉型期社會中形成一種激進主義的力量。由於這種激進主義是由社會動力結構自身所形成，並植根於草民之中而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在一些民主轉型社會中一度佔據社會的主導，並借助民主機制而獲得應得的權力。近期在巴勒斯坦大選中取得執政權的哈馬斯，即是其中的典型。

哈馬斯的形成和壯大，是巴勒斯坦社會長期痛苦和受壓抑的副產品，只要巴人的苦難未除，只要巴勒斯坦社會未走上健康自主社會的道路，哈馬斯就會產生並壯大。巴以的仇恨非一日之寒，況且巴人自治政府和法塔赫的執政未能解決與以色列

的關係問題，未能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現實困境。除巴人自身的因素外，以色列也沒有採取足夠有效的政策去緩和兩個社會之間的緊張和仇恨。當溫和力量未能為這個充滿不安與苦難的社會找到安寧和幸福的時候，激情容易取代理性，大眾更易接受激進主義。

哈馬斯的勝利，是激進主義在民主體制下取得的一次勝利。極端主義或激進主義利用民主給予的空間而崛起，在歷史上不乏先例。魏瑪共和國的憲法和民主體制即使按今日民主憲政的眼光看，也無可挑剔，但是，德意志帝國這個共和國的前身的榮耀留給人們的記憶是如此深刻，以致於當共和國的溫和力量對內既不能保障社會與生活的安定，對外又仍忍受大戰失敗的痛苦和戰勝國趾高氣昂的蔑視和壓制的時候，社會力量在極端主義旗幟下匯聚起來。一個充滿屈辱、怨恨、絕望、不安的社會，加上一個新生的、轉型中的不成熟的民主體制，冶煉出了極端激進主義的政權。納粹

是藉着民主程序上台執政的。我們無須再舉出更多的例子，就可以清楚民主轉型期的不成熟的民主社會給了激進主義一個又一個的機會。

必須指出的是，哈馬斯與納粹除了作為激進主義勢力這一點相同外，在本質上是有巨大差異的，只要記住一點就足以說明：哈馬斯通過民主程序上台執政，它無意消滅巴勒斯坦民主，相反，它努力改變自己的一些政策和慣用手段，以使自己能夠進入民主程序，在其取得大選勝利之後，它對自己的力量給予了自覺的約束，也推舉出相對溫和的人士出任總理。這顯示出哈馬斯在民主體制下具有重塑自身成為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可能性。與此截然相反，納粹藉着民主上台，卻公開聲稱要埋葬魏瑪民主，最終建立起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不僅葬送了民主共和國體制，更給國內外民眾帶來深重災難。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 的話可以佐證：

我們進入國會是為了從民主的兵器庫裏獲得民主的武器。我們成為國會的代代表是為了用魏瑪共和國自己的支柱去麻痺它的精神。假如民主特別愚蠢，給予我們自由旅行的特權，並為旅行發放津貼，那是它自己的事情。我們將採取合法的方式革新現存的狀態。

相較之下，哈馬斯並不顯示為民主的敵人。

正因為激進主義力量上台執政後的政策指向和行為方式各有不同，本國溫和健康的民主力量和國際社會正義與健康的力量就須要採取不同的對策。德國國內力量、以英法為代表的國際力量在對待納粹政權的政策與戰

略，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戰略錯誤與失敗。有了如此深刻的教訓，今日國際和國內力量在對付極端主義和各種形式的激進主義時，就不能再重蹈覆轍了。就這個意義上說，在哈馬斯未放棄恐怖主義、未向國際社會表現出其將作為健康力量的走向的時候，俄羅斯邀請其領導人訪問是一個嚴重錯誤，這不僅顯示出其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的自私傾向，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也是與其承擔的國際責任相違的行為。

美國人創造與發明的對付激進主義的理念與戰略值得重視與提倡，雖然其施加的對象是否合理見仁見智。像納粹這樣的極端勢力，除了遏制就是摧毀，國內和國際的健康的和正義的力量須要聯合採取強有力的手段，努力早日鏟除這種危害人類的極端力量，至少須要採用遏制的戰略，防止瘟疫的蔓延或邪惡的擴張。像哈馬斯這樣的激進主義力量，在聽其言觀其行的同時，必須採用在遏制基礎上的接觸政策。哈馬斯在遵從民主秩序的前提下取得政權，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國際社會應予尊重。甚至可以說，最激進的力量納入到了民主軌道上，尊重民主程序並願意按民主程序執政，這是民主的勝利而非失敗。只要一個社會中還存在着游離於民主之外的社會力量，民主始終是不安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哈馬斯參加大選並取得勝利，仍可看作是巴勒斯坦民主的深化和勝利。現在的問題不在這裏，而在於，極端主義或激進主義力量自身能否轉型和怎樣轉型。納粹本身不可能向溫和轉型和走向民主，而哈馬斯雖然在政策和手段上作出了調整，但它並未向國際社會表明它將徹底放棄恐怖主義手段和以負責任的

態度對待巴以以往達成的協議，以及理性地對待以色列。

對於頑固不化的激進主義政權，必須首先使用遏制戰略，控制其可能的危害的加大與蔓延。遏制戰略可在一段時間內造成對抗升級，但卻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否則任其惡性發展，那麼，即使不出現像納粹那樣的發展，像塔利班那樣的危害就足以讓阿富汗民眾和國際社會深受其害了。遏制或摧毀的政策有利於民主和平及人權的維護。另一種情況，即如今日的哈馬斯，雖然仍具有激進主義色彩和行為方式，但已作了一些調整，並有進一步向常規方向發展的可能，這就須要接觸與遏制並用。首先必須採取有效的遏制政策，遏制政策會給它的執政造成相當的壓力。在野的時候可能希望社會混亂、貧困、不安，以便從中獲取更多政治資源，一旦執政，就得努力維持自己的權力和鞏固執政地位。尤其在民主體制下，當外部壓力造成其執政困難和民眾不滿，它就不得不考慮如何才能在下一次選舉中保住執政權。這不同於極權主義體制，在極權主義體制下，可以通過封鎖消息、實行愚民政策，將外部遏制的壓力和造成的困難轉化為仇外情緒並鞏固自己對社會的控制，但民主方式獲勝的政黨和社會力量無法採用這種方式，這就使它在面臨真正的壓力時，可能調整和改變政策和行為模式。對於具備可塑性和可調整性的激進主義政權，在遏制的同時，引導其走向調整、走向溫和健康路線的另一策略就是接觸。接觸是一種信號，也展示一種前景，即它自我調整和向常規回歸後的前景。在對哈馬斯進行遏制的時候，展示接觸的可能空間和前

景，如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的援助，對巴以衝突的進一步調停和協助巴勒斯坦建國等，鼓勵哈馬斯作出調整。這種接觸不是俄羅斯那種形式的邀請，俄羅斯在未採取足夠遏制的情況下，在美國採取合理的遏制政策的時候，片面地採取接觸政策，向哈馬斯特別是其內部的強硬派傳遞了錯誤的信號，只會打亂國際社會健康的步伐，可能延緩哈馬斯的調整與轉型。接觸必須建立在必要的遏制基礎上。無疑，美國的战略應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美國的做法是出於其國家利益的考慮，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與國際社會具有共同的利益。美國的遏制，在本質上並不敵視和試圖摧毀哈馬斯，只是企望哈馬斯能夠改弦易張，成為民主社會中的健康力量，成為推進巴以和解與和平的力量。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理應朝着這樣的目標，協調成員國的腳步。

自由民主體制是迄今人類能夠發現並實施的最健康的體制，在其新生的階段，出現哈馬斯上台這樣的現象，也是民主在一些社會中須要付出的代價。如果國內力量特別是國際力量使用的戰略和策略正確，它仍可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的勝利，在有效的內外制約下，激進主義能量在民主體制中逐步釋放，並可能通過執政的考驗而被消蝕與退潮，在此之後，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即將來臨。肯定哈馬斯上台與肯定美國的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合理性。

丁松泉 政治學博士，現為浙江教育報刊社副編審。